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任保平 何 军 主 编

何爱平 高 煜 副主编

师 博 杜 勇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支持项目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陕西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支持项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任保平 何 军 主 编

何爱平 高 煜 副主编

师 博 杜 勇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 任保平, 何军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36 - 4364 - 1

I. ①当… II. ①任… ②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6028 号

责任编辑 霍宏涛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马晓宾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艾普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 60.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前 言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①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②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③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一系列讲话和论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系列讲话与决定在全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引发了巨大反响和积极响应。2015年11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 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4-07-09.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N]. 人民日报, 2015-11-25.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N]. 人民日报, 2015-12-2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2016年1月与4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分别举办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2016年1月23日，南京大学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2016年7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南开大学举办“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三期高级研修班。2015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坚持和几代人的传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成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科中的重点学科，在经济学学科发展中一直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西北大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经过长期发展，西北大学已经成为西部地区乃至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西北大学早在1912年就设立商科，1937年成立了经济系，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沈志远、罗章龙、季陶达等曾先后在我校执教。1985年西北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何炼成教授、白永秀教授、任保平教授等几代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政治经济学学科长期形成了“学科带头人+骨干力量+青年教师+优秀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稳定、结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在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新型工业化等重大研究方向持续展开研究，形成了重要影响。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以“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硕士点、博士点为依托，长期以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目前，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拥有政治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等学科平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研究，2016年4月24日，由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联合主办，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陕西宏观经济与增

长质量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范从来教授、葛扬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邱海平教授，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河南大学赵学增教授，以及陕西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杨三省研究员、陕西省社科院任宗哲教授、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陕西省行政学院曹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孔祥利教授、西安邮电大学张鸿教授、西安理工大学杨冬民教授应邀出席，会议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何军处长主持。会议围绕“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举办此次会议就是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对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积极回应和主动担当，学院将围绕中央的要求，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研究水平，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做出积极贡献。与会专家以及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师生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本书就是在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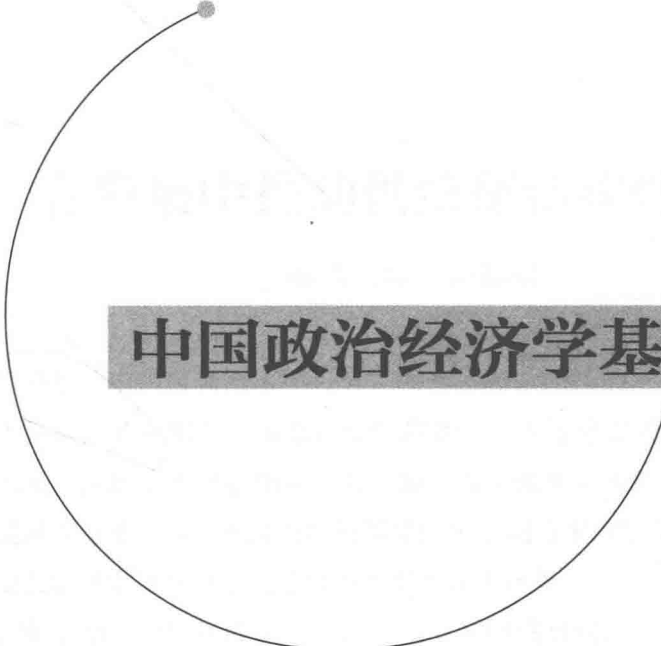
目 录

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在发展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洪银兴	3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任保平 何军	10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		
中国传统智慧	任保平 段雨晨	15
在市场与政府间寻找平衡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创新	赵学增	28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34
依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规律	何爱平 张志敏	5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发展		
——对研究框架的一个思考	高煜	62
从先秦史学研究范式创新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工具理性和中国化发展	赵麦茹	72
当代资本主义理性化改良理论与实践考查	李灵燕 石高宏	82
发展新理念的经济学分析	薛宝贵	93
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一种创新探索	何爱平 张志敏	109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思想的比较研究	石莹 何爱平	125

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把握时代发展的规律	任保平	149
农民退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张良悦 刘东	156
中国农村地权制度“被建构”与“被执行”的冲突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例	杨玉珍	17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及其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	任保平	203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任保平 郭晗	216
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继续创新中引领经济体制改革	232 宋宇	232
遵循政治经济学规律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吴振磊	246
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邓金钱	256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口资源环境 协调发展研究	张艳 何爱平 贾倩	269
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看待生态文明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域	石莹 何爱平	282
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雯雯 师博	298
在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中建设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任保平	309
西北大学成功举办“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研讨会		319



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在发展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南京大学 洪银兴

经济运行中供给和需求不可分，相互依赖。经济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两者的不平衡。经济调节，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是协调两者的关系。由供给和需求相互关系可知，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方向。经济发展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经济体制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作出选择。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调节偏向供给侧，主要手段是下达指令性计划，为生产而生产，结果是供不应求，产生短缺经济。现在转向市场经济，经济调节偏向需求侧。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尤其突出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应该说，这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供给侧的作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出现的经济增长问题表明，只是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就如近期为了推动实体经济止跌回升，国家通过降息和降准等途径扩大货币投放来刺激需求，但效果并不明显。这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还需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的作用。对此问题的理论说明，同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

当下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首先，当前经济下行问题不完全属于周期性问题，而主要是供给侧的结

构性问题。如果是周期性问题，可以等待经济复苏，但现在的问题是存在数量不小的过剩产能和高库存，形不成有效供给，会拖累复苏。而且，高杠杆和高成本不仅使众多企业成为僵尸，没有活力，还使许多地方政府存在过重的地方债务。在这种状况下，何来推动复苏的动力。因此，供给侧问题不解决，经济难以止跌回升。

其次，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只是需求侧“三驾马车”拉不动经济增长。表现在：一方面，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像预期的那么高。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典型的案例是，一边是消费者热衷于购买外国奶粉，另一边是国产牛奶因过剩倒入河中。另一方面，过剩产能不去掉，拉动起来的投资需求不但不能消化过去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过剩和库存，还可能进一步加大过剩和库存。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不景气，扩大出口需求也非常困难，而且面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工业4.0，中国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

基于这种判断，虽然实体经济回升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但更要靠供给侧发力。

我国的供给侧问题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属于长期问题。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供给侧问题既有发展方式方面的原因，又有供给侧的体制问题。因此，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既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又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的发展方式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解决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方面的需求。而我们的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过剩的问题。

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个重要任务，这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毫无疑问，这五方面问题根本上都同供给侧的制度相关，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解决。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讲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有三个：一是增加有效供给，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释放企业活力。这意味着改革还是要推动发展，至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方面问题，需要在服从于这三大目标的改革中去解决。单纯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会产生巨大的成本，而且难以有效实现目标。可行并且有效的路径是用发展的办法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原因是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不都是无用的，其中相当多的过剩产能、高库存和高杠杆恰恰是经济不发展带来的。发展就可能消化和吸收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且去掉部分因速度持续下滑所产生的杠杆。“补短板”更多的是补发展的短板。

基于上述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大目标。

首先是在改革中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

对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是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因此需求的拉动力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能就此以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在需求侧，从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不仅有需求要素，也有供给要素。在需求拉动没有充分的力量阻止经济下行时，不能忽视在供给侧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相比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持久。供给侧的这些动力可以归结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提出。他发现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进步，涉及投入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规模效益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制度创新，也就是供给

侧的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长期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所产生的过剩产能和库存就反映了要素配置的扭曲。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完善市场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意味着解决供给侧要素配置的效率问题仍然需要需求侧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是增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依靠创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我国目前的生产环节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处于附加值低的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的低端环节，需要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转移出低端，进入中高端。第三，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尤其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培养企业家，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在现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引领作用。

其次是在改革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针对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短缺，供给侧改革是要建立增加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现行供给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第一，适应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第二，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第三，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消费者蜂拥出国购买的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等，在技术上并不多么高超，中国也能制造但消费者不买账就说明了这点。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升供给能力并赢得消费者。

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内容的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创新不仅要高端，更要实，实在产品创新。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二是推动结构调整和优化。既要加大力度调整存量结构，腾出被无效和过剩产能占用的资源，还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补市场供给的“短板”。三是建立精细化的管理体制和文化，相当部分产品中国能生产但质量欠缺，根子在管理体制不精细和“马马虎虎”的企业文化。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和重塑精细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与此同时，在人才供给结

构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需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性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四是规范市场秩序。一方面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乱市”用重典，另一方面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这些方面的体制形成，就可以引导企业不只是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更多采取技术革新和产品质量的竞争方式，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提供更新、更好的服务。

明确了上述供给体系的改革目标，也就可明确当前的“去产能、去库存”的路径。去产能和去库存也就是在供给侧的市场出清。从长远来说，需要通过改革，以新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保证不再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和库存，而近期消化现有的过剩产能和库存，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这就是说，不排除需求侧采取扩大需求的方式。例如，“去产能”，在需求侧需要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由市场来淘汰过剩生产能力，从而形成相关企业去库存的外在压力。但市场淘汰的成本往往太大，可以在供给侧采取化解的方式。过剩生产能力并不都是无用的生产能力，寻求新的用处和去处化解过剩产能，就可以降低去产能的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可行的路径包括在“一带一路”上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打开扩大国际贸易的新通道。“去库存”，在需求侧主要是在发展中创造需求，如城市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环境治理工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供给侧则需要根据需求对库存进行调整，使之适销对路。因此，就提出能否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去产能和库存的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就像去房地产库存的加杠杆不能加到产生次贷危机的程度，但也不能绝对否认有限度的信贷杠杆对去库存的作用。从发展的角度为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而加一部分杠杆，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是精准并且有限度。

第三是在改革中释放企业活力。

尽管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不是源于美国里根时代的供给经济学，但是既然是谈供给侧，就有供给侧的经济学的特定问题。一般来说，需求侧的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市场选择资源流向，进入哪个地区、哪个行业、哪个企业，由充分竞争的市场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对企业产生外部压力。供给侧的经济学则关注激励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信息经济

学也要求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建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从机制上避究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这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其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连续47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同时还有许多负债企业由于因担保而产生的金融杠杆而被投入“僵尸企业”的行列。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过高的金融债务造成企业利息负担过高，以致资不抵债，甚至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问题的企业。就是说，现在许多地方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债务链条，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通过发展帮助企业“去杠杆”和“降成本”，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并且激活“僵尸企业”。我们可以相信，实体经济止跌回升，许多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去掉杠杆。

从改革的角度“去杠杆”，指的是更多采取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从当前的“去杠杆”任务来说，为了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精准地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尤其要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因承担不了脱离企业实际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员，最终受损的还是职

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和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以上意义的“去杠杆”和“降成本”必然会使“僵尸企业”范围缩小。“僵尸企业”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但是考虑到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着力点还是救活“僵尸企业”。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强调几个观点：

第一，当前拉动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作用。供给侧的着力点是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的着力点是完善需求管理。

第二，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如果作为改革任务，就不能只是单纯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改革是要解决长期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要在体制机制上防止和克服产生新的过剩产能、无效库存和高债务杠杆。例如，去产能需要建立防止重复建设和投资的体制机制；去库存需要建立增加有效供给的体制机制；去杠杆需要改革投融资体制，重点发展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

第三，供给侧和需求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解决供给侧问题离不开需求侧，适当采取扩大需求加有限有效杠杆的方式，四两拨千斤，能够有效解决供给侧的产能、库存和杠杆问题。